

阿尔及利亚卡比尔人问题探析

黄慧

内容提要 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尔人问题，是围绕卡比尔人作为少数族群的语言与文化权利而产生的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因素。法国殖民者对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区分为卡比尔人问题的产生埋下伏笔。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卡比利亚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内部市场的发展促成该地区成为一个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在此背景下，政府的阿拉伯化政策引发了卡比尔人的文化、政治运动。卡比尔人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近年来出现了跨国化、地方化的趋势。卡比尔人问题长期悬而未决一定程度上不利于阿尔及利亚的统一和稳定。

关键词 阿尔及利亚 阿拉伯化 卡比尔人问题 柏柏尔人

作者简介 黄慧，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博士生（北京 100871）。

卡比尔人是阿尔及利亚 4 支柏柏尔人中政治化程度最高的一支。他们主要生活在阿尔及利亚以东的卡比利亚地区，此外阿尔及尔、希提夫（Setif）、布阿拉里季堡（Bordj Bou Arreridj）和布迈德斯（Boumerdes）等城市一半左右的人口都是卡比尔人。法国殖民时期，卡比尔人是最顽强的反法力量。直到 1856 年，法国殖民当局才在卡比利亚建立殖民统治。此后，卡比尔人起义不断，其中最著名的是发生在 1871 年 2 月的 20 万人大起义。

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中，卡比尔人充当了“急先锋”。成立于 1926 年的第一个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政党“北非之星”就是以侨居法国的卡比尔工人为基础建立。1954 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者——民族解

放阵线成立，在9人最高领导集体中，有两位是卡比尔人^①。在武装斗争期间，卡比利亚地区是对法作战的重要堡垒。虽然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为导向，但卡比尔人仍为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付出了努力。

独立以后，阿尔及利亚开始了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中心的民族认同建设。官方否认柏柏尔人的存在，强调全体阿尔及利亚人都是阿拉伯穆斯林，强迫柏柏尔人学习阿拉伯语。卡比尔人因此发起了一系列文化、政治运动，主张确立柏柏尔语言和文化在阿尔及利亚的地位。卡比尔人问题也由此成为影响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的因素之一。

卡比尔人的缘起

如前文所述，卡比尔人与柏柏尔人有历史渊源关系。至于柏柏尔人，乃英文“Berber”的中译名，该词没有明确的来源。多数学者认为，该词最早为希腊人所用。它从“野蛮人”（Barbaros）一词派生而来，用来描述所有没有城邦组织或城邦文明的人群，也用来描述说生涩难懂的语言的人。柏柏尔人自称“阿马齐赫人”（Amazigh）^②，即柏柏尔语中自由、高贵者的意思。

伊本·赫勒敦这样描述他们“自古以来，柏柏尔人遍布马格里布的平原、山川、高原、乡村和城镇……他们强大、有力、勇敢而人数众多，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人种，就像阿拉伯人、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样……据说土伯尔王^③艾弗里基·本·盖斯·本·萨伊非（Afrigsh. b. Gais. b. Suifi）在进攻马格里布和非洲时遇见了他们，听了他们的语言后，他惊叹道‘你们说话真是嘟嘟囔囔’，他们因此被叫做柏柏尔人。柏柏尔一词在阿拉伯语中的原意是说话嘟囔、含混不清，当狮子发出咕噜咕噜低沉的喉音时，人们会说狮子在柏柏尔^④。”^⑤ 阿拉伯史料称，柏柏尔人是迦南人的一支，从巴勒斯坦地区迁徙到北非地区；西方学界则大多认为柏柏尔人来自欧洲大陆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① 卡里姆·贝尔卡西姆（Krim Belkacem）和侯赛因·阿提·艾哈迈德（Ait Ahmed Hocine）。

② 复数为“伊马齐赫”（Imazighen）。

③ 古代也门国王的称号。

④ 此处“柏柏尔”是动词。

⑤ 伊本·赫勒敦著《伊本·赫勒敦历史》（阿拉伯文版），时代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6~1834页。

无论柏柏尔人来自哪里，“考古发现证明公元前15世纪，柏柏尔人已在现在阿尔及利亚的疆域内建立了许多国家，形成了农业和畜牧业混合的经济模式，许多农产品已商品化。”^①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主要包括卡比利亚地区的卡比尔人（Kabyles）、奥雷斯（Aures）地区的沙维亚人（Shawiya）、盖尔特耶（Gharadia）附近的莫扎比特人（Mozabites）和霍加尔沙漠（Hoggar）地区的图阿雷格人（Tuaregs）。

卡比尔人是阿尔及利亚最主要的柏柏尔人分支。阿尔及利亚独立以来，政府推行阿拉伯化政策，并在1966年取消了人口普查中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的分类，因此无法从官方人口普查数据中获得卡比尔人的准确数量。多数文献认为，柏柏尔人占阿尔及利亚总人口的20%~30%左右，其中卡比尔人为数最多。有学者推测，卡比尔人已占阿尔及利亚总人口的20%。^②福克斯新闻网2010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卡比尔人的人口规模约在700万~1000万之间，其中约有200万主要生活在法国。^③

卡比尔人聚居的卡比利亚地区是阿尔及尔以东的一片“靠海的半圆形地区，东西长60英里，南北长40英里，占地约2500平方英里。”^④卡比利亚地区连绵多山，南端是阿尔及利亚最高的朱朱拉山脉（Djurdjura）。特殊的地形帮助卡比尔人保存了独立的语言和文化认同。卡比利亚地区最主要的两座城市提济乌祖和贝贾亚与阿尔及利亚的其他城市有着截然不同的风貌。^⑤

卡比利亚地区有3个传统的支柱产业：林业、贸易和对外劳务输出。卡比利亚地区多为山地，盛产各类果树和橄榄树。贸易和劳务输出是对林业收入的补充。法国殖民之前，朱朱拉山脉附近的部落商队游走于阿拉伯人聚居的区域，他们出售的商品包括珠宝、火器、农具、陶器、香料等。卡比利亚其他地区的居民则常常在农忙季节前往阿拉伯人聚居区务工。贸易和劳务输出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卡比尔人也因此与阿拉伯人聚居区保持着密切往来。法国殖民统治打破了阿尔及利亚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法国取代阿拉伯人聚

① John Ruedy, *Modern Algeria: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0.

② See Martin Stone, *The Agony of Algeria*, Hurst & Company, London, 1997, p. 4.

③ Ben Evansky, “New Ally in the War Against Al Qaeda?”, See <http://liveshots.blogs.foxnews.com/2010/01/28/new-ally-in-the-war-against-al-qaeda>, 2010-01-08.

④ David Galula, *Pacification in Algeria 1956-1958*, Rand Corporation, 2006, p. 27.

⑤ Martin Stone, op. cit., p. 198.

居区成为卡比尔人的贸易和劳务输出对象。卡比尔人由此逐渐形成向法国移民的传统。

在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前，卡比利亚地区没有形成统一的内部市场，其生产关系中的交换和消费环节与外部密切相关。1968年，阿尔及利亚政府出台了“大卡比利亚地区特别发展计划”。商业传统和丰富的劳动力使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新支柱。服务业方面，在提济乌祖、贝贾亚等中心城市，商业、饮食业、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逐渐建立起来；在山区，旅游业成为重要经济支柱。工业方面，阿尔及利亚国家纺织品公司（SONITEX）、阿尔及利亚国家电器公司（SONELEC）等企业最早在该地区投资设厂。随着经济的发展，山区和城镇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1971年国家巴士公司成立后，边远地区的交通服务得到大大改善。山区的剩余劳动力向中心城镇移民，成为服务业从业人员或工厂工人。卡比利亚地区内部的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这促成卡比利亚地区成为一个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时至今日，卡比利亚地区已经发展成阿尔及利亚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其中贝贾亚是制药、石化重镇，还是阿尔及利亚第二大港口；首府提济乌祖及其周边城镇是机械制造中心；伊夫里（Ifri）和阿克布（Akbou）是当前阿尔及利亚的食品工业基地。

卡比尔人问题的历史演进

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后，最高领导层坚信，要实现阿尔及利亚的真正独立，必须迅速切断阿尔及利亚与法国之间的联系，找到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记忆。推行阿拉伯化政策，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来取代法国文化对阿尔及利亚的控制，将阿尔及利亚打造成一个阿拉伯穆斯林国家，成为独立后阿尔及利亚民族认同建设的中心任务。柏柏尔文化在官方版本的阿尔及利亚属性中被彻底抹去，任何主张柏柏尔文化的声音都被视为挑战民族国家统一的地方主义和分裂主义。卡比尔人被强迫接受阿拉伯语教育，其语言和文化权利遭到限制。然而政府将阿拉伯属性强加在卡比尔人身上的做法并没有使他们“变成”阿拉伯穆斯林，反倒加强了他们对本族群文化的忠诚。为了维护自己的语言、文化权利，卡比尔人与政府间的摩擦时有发生，卡比尔人问题由此发展成影响阿尔及利亚稳定的一个因素。卡比尔人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

现，可分为以下4个发展阶段：

（一）地下反阿拉伯化运动时期

20世纪60至80年代，卡比尔人的活动仅限于地下的反阿拉伯化运动，其范围和影响力十分有限。这是因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当时的阿尔及利亚充满了生命力，卡比尔人对柏柏尔语言和文化权利的主张显得不合时宜。尽管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使阿拉伯民族主义遭到挫折，但阿尔及利亚仍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坚实堡垒。最有力的证据是，阿尔及利亚在1971年成为阿拉伯世界首个实现石油产业国有化的国家。

1968年，柏柏尔文化运动（Berber Culture Movement）在一次反布迈丁文化政策的学生活动中诞生。20世纪60~70年代，该组织主要开展秘密活动，是当时最激进的持不同政见组织。它宣传文化多元化，反对国家对柏柏尔人的种族清洗，主张柏柏尔人的语言、文化权利，反对政府的阿拉伯化政策。该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卡比尔人争取语言、文化权利运动的开始。

由于国内的活动只能处于地下状态，这一时期卡比尔人进行文化宣传的主要阵地在法国。1967年3月，柏柏尔文化研究与交流学会（Berber Academy of Cultural Research and Exchange）在法国成立。学会的创始人是柏柏尔主义运动的“精神教父”穆劳德·马马里（Mouloud Mammeri）^①以及柏柏尔作家兼歌手陶丝·阿姆若其（Taos Amrouche）^②。学会的骨干包括一批卡比尔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力量阵线的活跃分子。1969年，社会主义力量阵线成员穆罕默德·阿拉伯·比绍德（Muhammed Arab Bessaoud）将该组织更名为阿马齐赫阿格鲁（Agraw Imazighen）^③，简称阿格鲁。阿格鲁致力于争取柏柏尔人在阿尔及利亚的语言和文化权利的政治运动。它创办杂志，刊登柏柏尔语的文学作品，宣扬柏柏尔文化。这些非法刊物在柏柏尔大学生中被广泛传阅。阿

^① 穆劳德·马马里1917年出生在卡比利亚地区的陶里尔特米穆尼（Taourirt Mimoune）。他曾在法国和摩洛哥求学，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回国，在阿尔及尔大学任教。从1965年到1973年，他一直在人类学系讲授柏柏尔语，直到1978当局以人类学是殖民主义的学科为由撤销人类学系。他出版过两部柏柏尔诗集、一本柏柏尔语法书和若干柏柏尔文化散文。穆劳德·马马里被视为卡比尔人政治文化运动的“精神教父”。

^② 陶丝·阿姆若其出生在一个卡比尔天主教家庭，是阿尔及利亚第一位女作家，她将卡比利亚的传统音乐介绍到西方。

^③ “阿格鲁”是柏柏尔语，意为“大会”。

格鲁成为第一个正式提出要求柏柏尔语成为官方语言和民族语言的组织。^①

1972年，柏柏尔研究社（Berber Studies Group）在巴黎第八大学成立。该组织在两个层面上开展活动。一是学术研究层面。该社成员在巴黎第八大学成立了柏柏尔研究中心，主要从事柏柏尔语及柏柏尔文化的教学。他们还创办了一本学术期刊——《提斯拉夫》（Tisuraf）^②。该中心的研究活动受到许多知名学者的关注，人类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和民族主义理论家厄内斯特·戈尔纳都是《提斯拉夫》编委会的成员。二是大众文化层面。该社在巴黎建立了伊米德亚曾（Imedyazen）^③出版集团。这个集团出版了大量柏柏尔语诗歌、戏剧、小说、儿童读物、幽默小品文以及柏柏尔歌曲卡带，并负责《提斯拉夫》杂志的发行工作。

（二）柏柏尔人问题的公开化

1978年，布迈丁逝世。对于卡比尔人而言，布迈丁的去世意味着最坚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已不复存在。他们热切期盼新任总统沙德利对柏柏尔文化采取新的态度。然而沙德利上台后不久，宣布加大教育和公共服务领域的阿拉伯化力度，并对接受阿拉伯语教育的学生实行就业倾斜。在遭受了近20年的文化压迫之后，柏柏尔人改变的希望瞬间落空，他们的不满情绪因此达到顶点。

1980年初，传言称政府正考虑关闭卡比利亚地区的柏柏尔语广播。^④消息一出，整个地区陷入不安和骚动。1980年3月，政府取缔了提济乌祖大学举办的穆劳德·马马里有关卡比利亚古诗的演讲。随后几周，提济乌祖、阿尔及尔等地爆发了罢课、罢工和游行示威。柏柏尔文化运动是主要的组织者。事件迅速升级，政府只得出动军队平息动乱。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为“柏柏尔之春”^⑤。此后，卡比尔人问题彻底公开化。

柏柏尔之春并非单纯的卡比尔人要求语言和文化权利的运动。作为独立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众运动，柏柏尔之春给阿尔及利亚的命运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遭到挑战，多元化的话题被正式引入国家的

① Jane. E. Goodman, *Berber Culture on the World Stage: From Village to Video*,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8.

② 柏柏尔语音译，意为“小步伐”。

③ 柏柏尔语音译，意为“诗人”。

④ Martin Stone, op. cit., p. 206.

⑤ 参见黄慧《论当代阿尔及利亚的认同危机》，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4期，第47页。

政治生活，阿尔及利亚人对民主、人权和文化多元化的要求被唤醒。由此，柏柏尔之春开启了阿尔及利亚发展道路的争鸣，同时拉开了阿尔及利亚政治动荡的序幕。

（三）卡比尔人问题与民主化

1980年以后，卡比尔人与阿尔及利亚政府之间不断发生摩擦。政府因此加大了阿拉伯化的力度，同时加强了对卡比利亚地区的文化控制。当局坚持“一种语言、一种宗教、一个民族”是阿尔及利亚的立国之本。在这样的氛围中，卡比尔人采取了新的策略。他们建立了许多名义上与民族解放战争烈士挂钩的烈士子女组织，包括总部设在提济乌祖的“哭泣”组织、谢里夫的“月亮”组织等。^①这些组织表面上以改善革命烈士遗孀及其子女的生活为目的，实际上致力于推动民主、言论自由、文化多元化，特别是保护柏柏尔人的语言、文化权利。官方没有承认任何一个烈士子女组织。卡比尔活跃分子利用这一点将柏柏尔人的语言文化权利与人权挂钩。他们指责政府侵犯了公民的结社自由，并于1984年12月宣布建立阿尔及利亚人权联盟（LADH）。^②

80年代，柏柏尔人主导的人权运动是促成阿尔及利亚社会进一步向西方自由民主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休·罗伯茨认为，80年代的这种变化意味着“柏柏尔主义运动为以人权为焦点的自由民主运动让路”。^③该论断暗含着将柏柏尔主义运动限定为少数族群认同运动，将80年代的人权运动视为对柏柏尔族群认同运动的替代。从宏观的角度看，人权运动很大程度上是认同运动的一种策略和手段，80年代的变化意味着卡比尔人问题从柏柏尔人的语言文化权利向更广阔的领域延伸。无论这两种运动之间的关系如何，1985年以来的人权运动无疑给沙德利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压力，也给阿尔及利亚政治生活带来了微妙的变化。1987年，为促成人权运动内部分化，沙德利政府批准了一个同样名为“阿尔及利亚人权联盟”的组织。阿里·叶海亚将自己的“阿尔及利亚人权联盟”更名为“阿尔及利亚捍卫人权联盟（LADDHH）”。尽管官方人权联盟是为制衡阿里·叶海亚而建，但由于这一组织既不隶属于

^① Katherine E. Hoffman and Susan Gilson Miller, *Berbers and Others: Beyond Tribe and Nation in the Maghrib*,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11.

^② 该联盟由前农业部部长、阿尔及利亚总工会创始人、律师阿卜杜·努尔·阿里·叶海亚（Abdennour Ali Yahia）发起，由来自提济乌祖的烈士子女组织成员组成。

^③ Hugh Roberts, *The Battlefield Algeria 1988 – 2002: Studies in a Broken Polity*, Verso, 2003, p. 29.

政府，也不隶属于民族解放阵线，无疑成为民族解放阵线所垄断的公共生活中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①

80年代末，随着冷战进入尾声，阿尔及利亚发生了政治剧变，民族解放阵线倒台，民主化进程开始启动。1989年，阿尔及利亚开放党禁，各种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立于60年代的卡比尔人政党——社会主义力量阵线获得合法身份，另一个卡比尔人政党争取文化与民主联盟在同年建立。卡比尔人期待在民主体制下，以直接参与政治的方式实现柏柏尔文化在阿尔及利亚的地位。1990年，在两个卡比尔人政党为参加1991年大选作准备的同时，柏柏尔文化运动组织了新一轮的游行活动，再次向沙德利政府提出了承认柏柏尔语的民族和官方语言地位的要求。然而伊斯兰主义的风暴使阿尔及利亚的民主化进程陷入尴尬境地。在1991年进行的阿尔及利亚首届立法选举中，伊斯兰拯救阵线得票遥遥领先，军方遂取消了选举，阿尔及利亚陷入内战。卡比尔人的语言和文化权利问题被搁置。

内战中，卡比尔人的两个政党出现了不同的政治倾向。社会主义力量阵线认为与伊斯兰拯救阵线和解是结束内战的唯一途径。但它拒绝参加1992年以来统治阿尔及利亚的各届军政府。1995年，它在罗马与伊斯兰拯救阵线签署和解协议，呼吁在协商、多元化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同时抵制了当年的总统选举。争取文化与民主联盟参加了1995年和1999年的大选，加入了布特弗利卡政府。但该党坚决反对与伊斯兰拯救阵线对话，“反对一切中东或阿富汗式的认同向阿尔及利亚渗透，抵制阿尔及利亚成为国际伊斯兰主义运动的追随者，呼吁卡比尔人追随‘永恒的朱古达自由精神’”^②。

两个卡比尔人政党的出现很大程度上统一了各种分散的卡比尔政治力量和异见派。尽管两党都将实现卡比尔人的语言、文化权利视为己任，但爱国主义是它们共同的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的出现降低了卡比尔人问题对阿尔及利亚政治稳定的破坏性。卡比尔人拥有了合法的代言人，阿尔及利亚政府本可通过与它们达成谅解实现卡比尔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抑或通过制衡两党有效控制卡比利亚地区。然而，两党的内部分歧却削弱了它们的影响力，继而引发柏柏尔文化运动的分裂。新一代的卡比尔活跃分子因此开始另

^① Hugh Roberts , op. cit. , p. 30.

^② James McDougall , *Nation , Society and Culture in North Africa* , Frank Cass Publishers , 2003 , p. 95.

谋他途。

（四）反政府群众运动回潮

90年代末，卡比尔人又回到了“柏柏尔之春”的运动轨迹，反政府群众运动开始回潮，标志性事件是1998年的大规模游行示威。1998年6月，卡比尔政治歌手罗纳斯·穆塔卜（Lounes Matoub）在提济乌祖附近遇刺身亡。此后不久，泽鲁阿勒政府宣布执行《阿拉伯语法》。这项法令规定在阿尔及利亚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全面使用阿拉伯语。卡比利亚地区因此爆发了为期数周的抗议活动。一些柏柏尔武装组织宣布将对凶手实施报复，并阻止《阿拉伯语法》的执行。示威活动导致卡比尔人问题再度升级。这次事件是“柏柏尔之春”后最严重的一次卡比尔群众运动。两个柏柏尔政党完全无法控制局面，它们一方面呼吁示威者保持克制，另一方试图利用群众运动给政府施压，以废除这项语言政策。然而两党的和平政治运动难以满足新生代卡比尔激进分子的要求。

新生代卡比尔激进分子出生在80年代的“柏柏尔之春”之后。由于出生在动荡时代，成长在内战之中，他们充满了对国家的绝望，成为新时期影响阿尔及利亚政治稳定的一个群体。1998年以后，卡比尔青年的示威活动频繁发生。新一代示威者的要求不再局限于卡比尔人的语言、文化权利。他们抗议被边缘化、不平等、缺少公平正义和“二等公民”的地位，批评政府在就业和住房分配上的腐败。与其父辈相比，他们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的光辉历史并不熟知，爱国主义情怀正在减弱，卡比尔问题开始表现出超出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范畴的倾向——卡比尔人的民族主义。

卡比尔人问题中的法国因素

（一）法国殖民者区分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的政策

从历史上看，柏柏尔人的确是北非地区的原住民，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之间的确存在差异。但是经过长期的伊斯兰化，他们之间的共性远大于差异性。在法国人到来之前，阿尔及利亚当地人对自己的族群属性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只是说阿拉伯语者和说柏柏尔语者的差别。法国殖民当局为了实现分而治之的目的，竭力证明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差别，声称阿拉伯人和

柏柏尔人仅以“伊斯兰教为唯一联系”^①，竭力挖掘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在历史上的差异，以东方主义的逻辑将柏柏尔人划为西方世界的高贵的“我们”，将阿拉伯人划为东方世界的粗鲁的“他们”。

曾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地中海和北非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的安德烈·朱利安就断言，柏柏尔人在文明和语言上是统一的，除几个部落被混合以外，现代柏柏尔人同有史初期相比没有任何变化。^②这一论断显然暗示了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并没有发生真正的融合，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完全不同。1930年起担任法国驻北非三国殖民总督的马塞尔·佩鲁东则直接指出，“柏柏尔人属于白种人，起源于欧洲南部，是阿尔卑斯族人；而阿拉伯人则是闪米特族人。”^③

当年法国殖民者对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区分被当代的英、美学者继承。有学者指出“柏柏尔人本属印欧人，他们的山区文化建立在独立和辛勤劳动作的基础之上，因而他们更接近于奥弗涅（Avergne）农民而非阿拉伯人。”^④更加危言耸听的观点是“穆罕默德的宗教阻碍柏柏尔人进入欧洲的进步、自由之路，这不仅是他们的不幸，还是整个文明世界的不幸。”^⑤

对于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区分，突尼斯学者穆罕默德·穆赫塔尔·阿拉巴维（Muhammad Mughtār ‘Arbāwī）犀利地指出“法国殖民马格里布国家时，对当地居民进行族群区分，把他们分成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声称两者毫无关系，阿拉伯人不过是外来入侵者……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柏柏尔主义是法国殖民政策的结果。”^⑥

① [法国] 佩鲁东 (Peyroufon, M.) 著；上海师范大学《马格里布通史》翻译组译 《马格里布通史：从古代到今天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页。

② [法国] 朱利安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北非史：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第一卷：从上古时代至阿拉伯人征服：公元647年》（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9页。

③ [法国] 佩鲁东 (Peyroufon, M.) 著；上海师范大学《马格里布通史》翻译组译：前引书：第20页。

④ Martin Evans and John Phillips, *Algeria: Anger of the Dispossessed*,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35.

⑤ See Melville William Hilton – Simpson, *Among the Hill Folk of Algeria* (1921), Read Books, 2007, p. 4.

⑥ [突尼斯] 穆罕默德·穆赫塔尔·阿拉巴维著 《应对柏柏尔主义及其分裂主义威胁》（阿拉伯文版），阿拉伯图书联盟，2005年版，第113页。

（二）法国是卡比尔人文化政治运动的海外基地

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卡比尔人就在法国建立了许多组织，例如前文提到的柏柏尔文化研究与交流学会和柏柏尔研究社。这两个组织在法国从事卡比尔文化的宣传，它们在海外出版的刊物、书籍在卡比利亚地区秘密传播。在全民接受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教育的年代，这些出版物持续地为卡比尔人勾勒属于他们的族群认同。

“柏柏尔之春”前后，更多的卡比尔人组织在法国建立。其中包括巴黎的柏柏尔文化社（ACB）、柏柏尔资料信息研究社（ABRIDA），鲁贝的手牵手组织（Hand in Hand）、里昂的阿西兰组织（Assiren）等。柏柏尔文化社还在法国各地建立了多个分支机构。^① 这些组织在 1980 至 1990 年间赞助了许多关于柏柏尔历史、文化的研讨会和柏柏尔语课程。这些组织一方面致力于法国卡比尔人权利保护，另一方面密切关注着阿尔及利亚国内的卡比尔人问题。“柏柏尔之春”期间，伊米德亚曾旗下媒体对事件进行了深度报道，成功地将大赦国际等国际人权组织吸引到卡比尔人问题上，并促成了 24 名卡比尔激进分子在当年 6 月无罪获释。

1985 年 6 月 5 日^②，一批烈士子女组织和人权联盟成员发起了一场集体悼念革命烈士的行动。他们在阿尔及尔、布米尔达斯（Boumerdes）^③、谢里夫、汉舍莱（khenchela）^④、提帕萨（Tipaza）^⑤、提济乌祖的革命英雄纪念碑和悼念活动现场放置花圈。^⑥ 政府逮捕了肇事者，将他们押往麦迪亚省贝鲁瓦吉耶监狱^⑦。1985 年 11 月中旬，23 名活跃分子因“非法结社”、“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被送上了麦迪亚国家安全法庭。同样也是伊米德亚曾集团对此事进行了全程跟踪。法国人权联盟和法国工会对此事表示密切关注，并参与了法国

① James McDougall, op. cit. , p. 93.

② 1962 年 6 月 5 日，本·赫达领导的临时政府宣布定都提济乌祖。柏柏尔人选择这一天发起纪念活动无疑是反对民阵版本的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一种挑衅。

③ 阿尔及利亚北部沿海城市，位于阿尔及尔和提济乌祖之间，属于卡比利亚地区。

④ 阿尔及利亚西北部内陆城市，位于君士坦丁以南。

⑤ 阿尔及利亚北部沿海城市，位于阿尔及尔以西。

⑥ Jane E. Goodman, *Imazighen on Trial: Human Rights and Berber Identity in Algeria* , 1985 , from Katherine E. Hoffman and Susan Gilson Miller, *Berbers and Others: Beyond Tribe and Nation in the Maghrib*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2010 , p. 112.

⑦ 1994 年 11 月 14 日，贝鲁瓦吉耶监狱罪犯试图越狱，随后发生了大屠杀，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 8 人，但阿尔及利亚《人民报》报道称死亡人数高达 200 人。

卡比尔人社区组织的抗议活动。

1995 年建立的世界阿马齐赫大会、2001 年建立的卡比利亚自治运动都将总部设在法国。2010 年建立的卡比利亚临时政府也设在法国。从 60 年代至今，法国一直是卡比尔人的海外阵地。无论是难以在阿尔及利亚国内生存的卡比尔人组织还是遭到政府通缉的卡比尔活跃分子，几乎都选择退避法国，遥控指挥国内的运动。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法国政府给这些组织和人员提供了支持，但长达 50 余年的实践足以证明，法国至少默许了卡比尔人在其境内的活动，这种做法极有可能是为了保持其对阿尔及利亚的影响力。

卡比尔人问题的发展趋势

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尔人问题起初只是在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框架内少数族群的语言、文化权利问题，卡比尔人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但对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仍然保持强烈的认同。1995 年，阿尔及利亚政府决定建立阿马齐赫高级委员会（High Amazigh Commission），负责将柏柏尔语纳入学校教育的相关事宜。但两个卡比尔人政党之间的分歧导致这一计划最终搁浅。新一代的卡比尔活跃分子开始反思前一代精英的行动路线。以 1995 年为节点，卡比尔人问题出现了两个新的趋势：跨国化和地方化。跨国化是指卡比尔人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出现了世界性的阿马齐赫运动；地方化是指卡比尔人运动的重点从强调全国范围内的柏柏尔文化和柏柏尔语的地位，转向谋求卡比利亚地区自治。

（一）卡比尔人问题的跨国化

1. 卡比尔人的跨国组织——世界阿马齐赫大会

卡比尔人问题的跨国化具有一定的历史基础。1980 年的“柏柏尔之春”向世界其他国家的柏柏尔社区特别是卡比尔人社区输出了柏柏尔人的族群认同。卡比利亚地区和国外流散社区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世界各地的柏柏尔社区每年 4 月都会举行各种形式的“柏柏尔之春”纪念活动。境外的卡比尔人组织的数量迅速膨胀。例如 20 世纪 80 年代在巴黎建立的柏柏尔文化联盟（Berber Cultural Association）、欧洲柏柏尔运动（Beur Movement）；90 年代在加拿大建立的美洲阿马齐赫文化联盟（Amazigh Cultural Association）；2000 年

后在蒙特利尔建立的阿马齐赫中心 (Centre Amazigh de Montreal) 等组织。^①这些组织致力于保护卡比尔人在所在国的各项权利和卡比尔文化在海外社区中的传承。

世界各地卡比尔人文化组织的建立加强了卡比尔人的族群认同，全球的卡比尔社区开始尝试建立联系，世界阿马齐赫大会 (World Amazigh Congress) 应运而生。该组织成立于1995年，总部设在巴黎，目标是建立“真正的阿马齐赫主权”，实现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柏柏尔人共同体。其成员来自北非、撒哈拉沙漠以南以及欧美的卡比尔人和其他柏柏尔人社区。1997年，该组织在加那利群岛召开了第一届代表大会。^②阿尔及利亚卡比尔人对该组织态度不一。持反对态度的代表是争取文化与民主联盟，它认为参会只会造成资源浪费，卡比尔人应当将活动的重点放在国内，而非跨国的柏柏尔民族主义。

2. 跨国的柏柏尔民族想象

除了实体的跨国组织外，柏柏尔语电台、卫星电视、网络等传媒也随着科技进步不断发展。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卡比尔人通过这些媒体获知阿尔及利亚的最新动态和全球卡比尔人的生存状况，构建起一个“虚拟空间中的共同体”，在全球的卡比尔人社区间建立了快捷有效的联系。最明显的例子是在2001年的卡比利亚游行之后，巴黎、马赛、拉巴特等地的卡比尔人很快举行了示威活动，配合阿尔及利亚卡比尔人的行动。

卡比尔人的诉求还通过足球实现了跨国性的表达。卡比利亚青年足球俱乐部队 (JSK) 是一支非洲强队，它曾赢得11次阿尔及利亚全国俱乐部联赛冠军、4次阿尔及利亚杯冠军、2次非洲俱乐部冠军联赛冠军、一次非洲冠军杯冠军、一次非洲超级杯冠军。^③骄人的战绩使该俱乐部成为卡比尔人的骄傲。卡比利亚青年足球俱乐部队在全球的卡比尔人社区中吸引了大批支持者，其主场比赛成为展示卡比尔文化的舞台，球队的黄色队服在世界各地的卡比尔人示威活动中经常出现。

（二）卡比尔人问题的地方化

卡比尔人问题的地方化是卡比尔人问题在最近10年表现出的新趋势，对

^① See Jane E. Goodman, op. cit. , p. 215.

^② See Hsain Ilahian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erbers (imazighen)* ,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 2006 , pp. 140 – 141.

^③ James McDougall, op. cit. , p. 99.

阿尔及利亚的统一和稳定构成了直接威胁。2001年4月18日，“柏柏尔之春”纪念日前夕，一名卡比利亚少年在警察局内被宪兵杀害。他的死讯引发了一场严重暴乱，这次暴乱是1998年事件的进一步升级。卡比利亚地区的主要城市均爆发了游行示威。示威活动持续了两周，示威者与警方发生了严重冲突。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为“黑色春天”。“黑色春天”中的卡比尔示威者表现出了新的特征。示威者打出了“解放卡比尔人”的标语；在卡比利亚境内设置了路障，要求过往车辆提供通行证；此外还袭击了政府机构，以及争取文化与民主联盟和社会主义力量阵线的总部。这些行为表明，新一代的示威者开始主张自己是卡比利亚地区的主人，他们对坚持爱国主义立场的卡比尔人政党失去了耐心。

2001年的暴乱是阿尔及利亚卡比尔人问题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此后卡比尔政治分化成两个阵营：以社会主义力量阵线和争取文化与民主联盟为代表的在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范畴内争取卡比尔人权利的“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派”，和新出现的“卡比尔民族主义派”，后者提出了卡比利亚地区自治甚至独立的要求，这标志着卡比尔人问题朝着地方化的方向发展。暴乱期间诞生的两个组织柏柏尔阿若其公民运动（Berber Arouch Citizen's Movement）和卡比利亚自治运动（Movement for the Autonomy of Kabliya）是卡比尔问题地方化的代表。

柏柏尔阿若其公民运动是以卡比利亚地区的传统政治集会——“阿若其”制度为准则建立的。阿若其以集体会议制为最高权力机构，带有一定的民主色彩。对于卡比利亚地区的未来问题，公民运动内部有三派意见：一派支持实行联邦制；一派支持地方自治；最后一派主张分权。该组织成立后很快建立了6个地方协调委员会：提济乌祖直辖市民主协调委员会（CADC）、贝贾亚省市协调委员会（CCIB）、贝贾亚省人民协调委员会（CPWB）、贝贾亚区际协调委员会（CIQB）、布维拉省公民协调委员会（CCCWB）和省际协调委员会（CIW）。

2001年6月11日，柏柏尔阿若其公民运动在贝贾亚的克塞尔镇（Kseur）召开会议，建立了克塞尔平台，并提出“15点要求”，敦促政府与他们谈判。“15点要求”的核心是“无条件、不经过公投满足阿马齐赫人（柏柏尔人）对于认同、文明、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所有要求，承认塔马齐赫语为民族和官

方语言之一”^①。柏柏尔阿若其公民运动同样借助克塞尔平台提出了发展经济、推进自由民主等全国性的要求。

2004年1月，阿尔及利亚政府与公民运动代表进行了谈判，政府同意接受克塞尔平台提出的若干条件。但最终政府只是释放了在2001~2004年间被逮捕的公民运动分子，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让步。2004年3月26日，在阿尔及利亚大选前夕，公民运动发起了抵制选举活动，防暴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5天后，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对卡比利亚地区进行了1999年上台以来的首次视察。公民运动组织了一场大罢工，卡比利亚地区多数学校罢课，商店停止营业。

卡比利亚自治运动是卡比尔人问题地方化更明显的一个例证。它所提出的自治主张完全是“卡比尔民族主义”的直接表现。2004年，该组织正式提出卡比利亚自治的要求，同时呼吁在阿尔及利亚实行联邦制民主。2007年该组织抛出了一份“卡比利亚自治计划”。该计划强调“卡比尔人以其语言、文化和历史形成了独特的认同和属性”，指出“克塞尔平台只能通过自治才能完全执行”，建议“在卡比利亚地区全民公决后宣布卡比利亚自治”。^②

卡比利亚自治运动提出的自治主张，直接体现了2001年“黑色春天”中示威者的新要求。在卡比利亚自治运动的努力下，实现卡比利亚自治的理念在卡比利亚地区扩散。2006年11月，“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派”的社会主义力量阵线在提济乌祖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呼吁增加卡比利亚地区的自治权力。随着卡比尔人自治意愿的增强，卡比利亚自治运动出现了更大的野心，开始谋求卡比利亚地区独立。2010年4月20日，“柏柏尔之春”30周年纪念日当天，该组织宣布筹备卡比利亚临时政府，声称当前的卡比利亚是“被占领土地”^③。

① Mohand Salah TAHI, “North African Berbers and Kabylia’s Berber Citizens’ Movement”, http://www.tamazgha.fr/North-African-Berbers-and-Kabylia-s-Berber-Citizens-Movement_225.html, 2011-07-04.

② See “Kabylia Autonomy Project”, <http://mak.makabylie.info/Kabylia-autonomy-project-KAP?lang=en>, 2011-07-04.

③ 参见亚辛·塔姆拉里 《费尔哈特·迈赫尼的临时政府和卡比尔人的传说》，<http://www.ahewar.org/debat/show.art.asp?aid=214929>, 2011-05-05.

结 语

卡比尔人曾投身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拥有较强的爱国主义情怀。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卡比尔人的诉求未超出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的框架。近年来卡比利亚自治运动出现了分离主义倾向，但这种倾向能否在卡比利亚地区获得广泛支持还存在一定疑问。社会主义力量阵线和文化与民主联盟仍是卡比利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政党，在2005年的地方议会选举中，两党分别获得188席和139席，几乎包揽了所有卡比尔人议席。对于以两党为代表的卡比尔政治精英而言，选择支持卡比利亚临时政府，无异于作茧自缚，意味着放弃进入阿尔及利亚最高领导层的机会。如果无法获得其他卡比尔政治精英的支持，流亡海外的临时政府很难在卡比利亚地区组织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1988年以来，阿尔及利亚的民主化尝试致使国家陷入近10年的内战，造成至少16万人丧生。在经历了长期战乱之后，阿尔及利亚民心思定。2011年年初爆发的突尼斯骚乱一度波及阿尔及利亚，但目前阿尔及利亚政局总体稳定。尽管事件还在发展之中，但已有观察家指出，经历了长期的暴力之后，阿尔及利亚民众正在权衡变革的代价。^①

除此之外，阿尔及利亚政府也在逐渐改变对柏柏尔文化的态度。1996年11月，阿尔及利亚全民公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新宪法确立了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阿拉伯、柏柏尔属性；2002年，阿尔及利亚再次修宪，承认柏柏尔语为民族语言，但非官方语言。2011年5月，阿尔及利亚启动了政治改革协商，准备修改宪法、选举法。政府宣布“除了暴力活动的支持者外，政治改革协商不会排除任何政治力量的参与。有关改革的讨论是完全自由的，不存在任何限制，只要这些提议不违背宪法中确定的有关国家根基和民族身份的内容。”^②

上述分析表明，卡比尔人问题具备在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框架内解决的可能性。但这一问题仍在发展之中，卡比尔人政治、阿尔及利亚国内以及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都有可能给卡比尔人问题带来新的变量。

^① Anthony Faiola, “In Algeria, A Chill in the Arab Spring”,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in-algeria-a-chill-in-the-arab-spring/2011/04/07/AFdA9E4C_story.html, 2011-06-02.

^②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5/22/c_121443253.htm, 2011-06-05.

Analysis on the Kabyle Issue in Algeria

Huang Hui

Abstract: The Kabyle Issue in Algeria is a series of political , social and cultural issues deriving from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rights of the Kabyles as a minority ethnic group. This question is caused by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factor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rabs and Berbers made by French Anthropologists during the colonial age is supposed to be the foreshadowing of this question. Since independence , the adjustment of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market in Kabylia have promote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the region. Meanwhile , the government's Arabization policies directly led to the rise of kabyl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The kabyle question performs differently in different periods , whereas the transnation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are two new dimensions of this unresolved question which is considered to be a challenge to the unity and stability of Algeria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 Algeria; Arabization; Kabyle Issue; Berbers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